

中华民国史

第二编 北洋政府统治时期

主编 李 新 李宗一

第一卷(1912—1916年)上

中 华 书 局

中 华 民 国 史

第二编 北洋政府统治时期

主编 李 新 李宗一

第 一 卷 (1912—1916 年)下

本卷著者 李宗一 曾业英 等
朱宗震 徐辉琪

中 华 书 局

中 华 民 国 史

Zhonghua Minguo Shi

第二编 北洋政府统治时期

主编 李 新 李宗一

第一卷 (1912—1916年)

本卷著者 李宗一 曾业英 等
朱宗震 徐辉琪
(全 二 册)

*

中 华 书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1/32·28¹/₈印张·17插页·626千字

1987年9月第1版 1987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5,000 册

统一书号: 11018·1479 定价: 6.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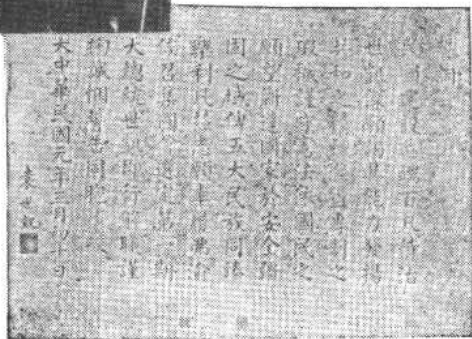
ISBN 7—101—00000—2/K·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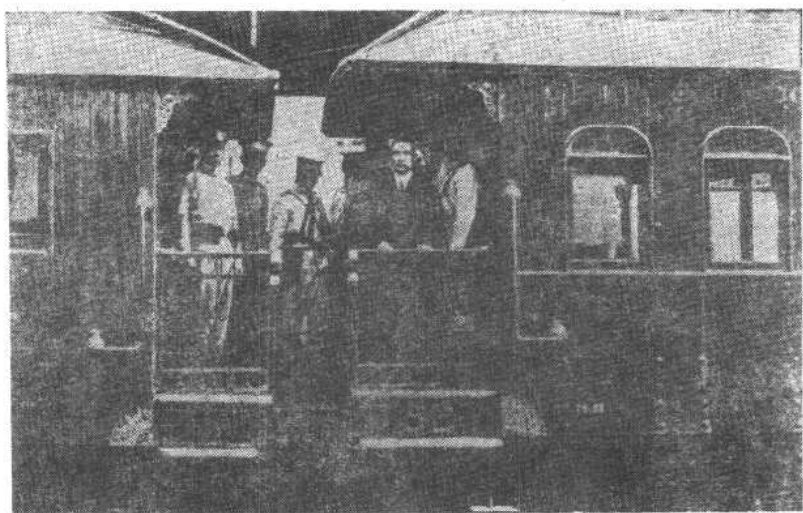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向临时参议院辞总统职后留影。前排左四起：黄兴、唐绍仪、孙中山、王宠惠、蔡元培（文物出版社存）



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职后，与北洋将领合影。右下角为袁世凯就任誓词（采自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8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孙中山在由天津赴北京的专车上(文物出版社存)



国民党上海交通部全体职员合影(采自《国民》第1卷第1号, 1913年5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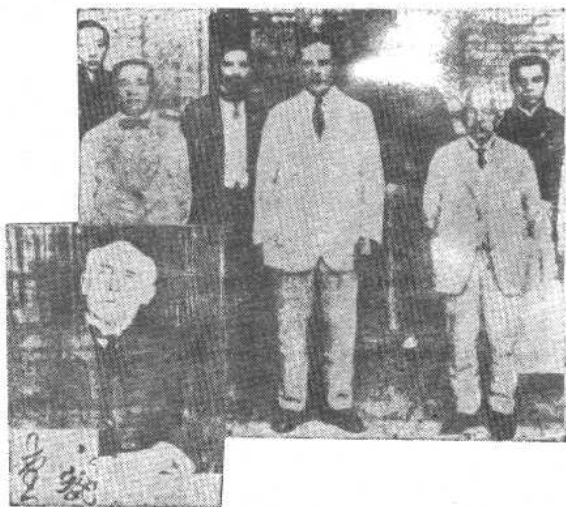
宋教仁被刺后遗像(采自《国民》第1卷第2号, 1913年6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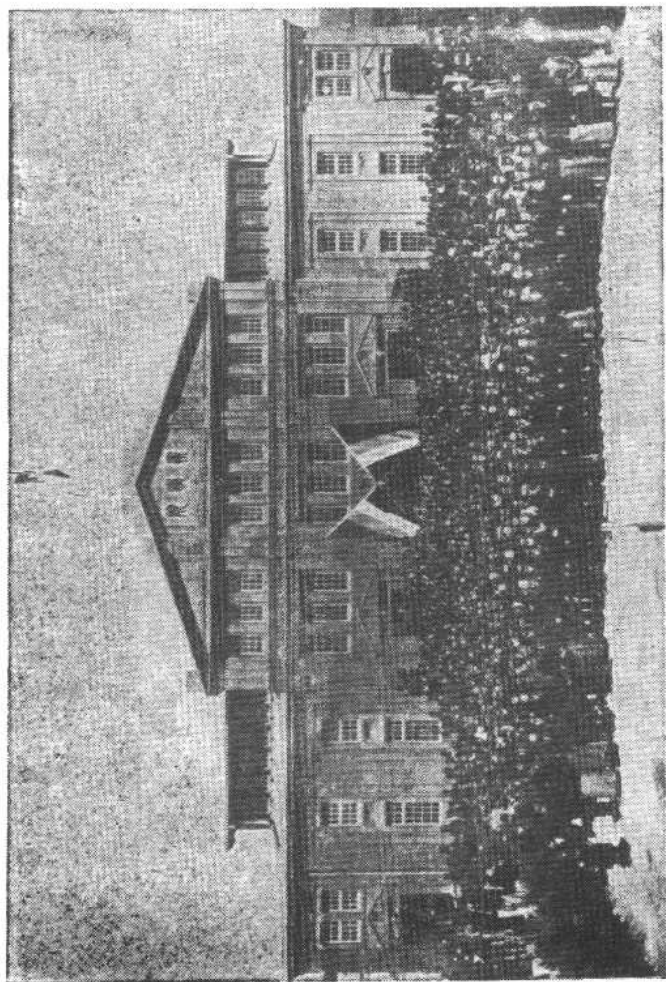
参加西姆拉会议人员合影。前排左三起: 陈貽范、麦克马洪、萨屈拉
(采自《东方杂志》第10卷第7号, 1914年1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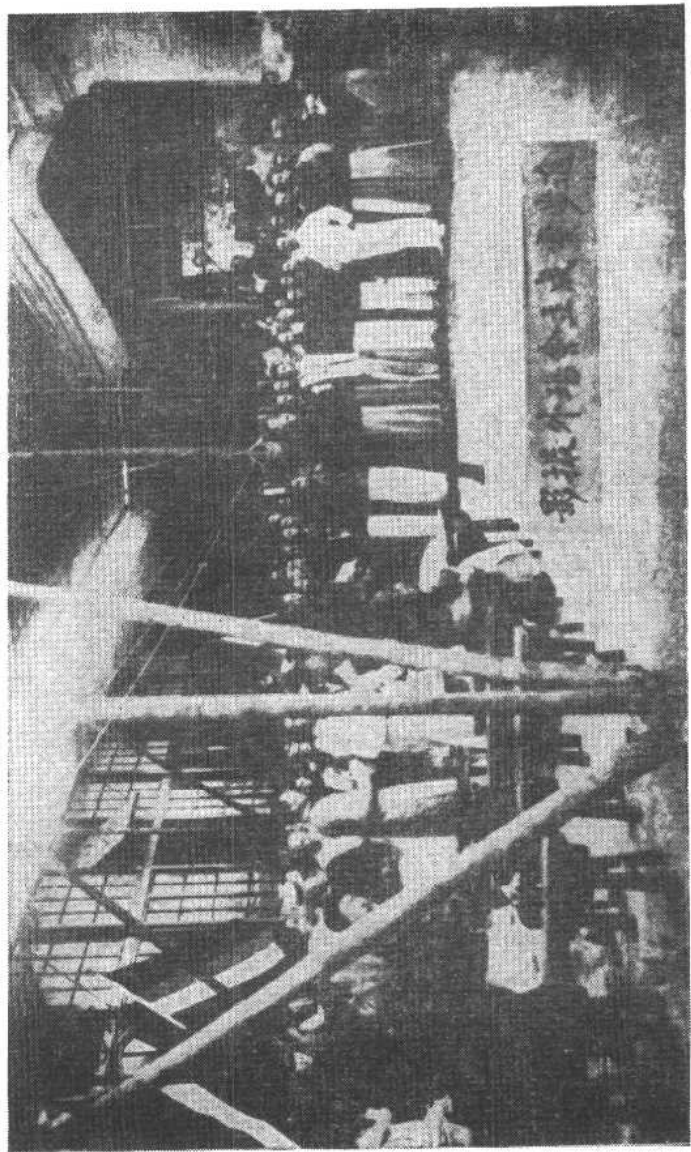
1912年7月10日成都各界
欢送西征军总司令尹昌衡率队
出发(采自《东方杂志》第9卷第
3号, 1912年9月)



袁世凯的顾问美国人古德诺(中)、日本人有贺长
雄(右)和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左下角)(采自中华民
国史画编纂小组:《中华民国史画》第1册,台北近代
中国出版社 1978年版,第338页)



1913年4月8日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开幕典礼(采自《东方杂志》第9卷第11号,1913年5月)



1913年5月29日进步党在北京磨盘院举行成立大会。身着白衣者右侧为该党理事梁启超（采自《中华》第1卷第1号，1914年4月）



1914年进步党要人合影。左起前排：蔡锷、王家襄、汤化龙、梁启超、林长民、陈敬第；后排：蹇念益、汤觉顿、籍忠寅、周大烈、陈国祥、黄远庸、黄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存）



1913年2月孙中山与黄兴等人在上海合影(文物出版社存)



江西都督李烈钧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存)



安徽都督柏文蔚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存)

原沪军都督陈其美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存)



广东都督胡汉民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存)



黄兴致白永丞(白朗)函(采自上海《神州日报》，1913年8月14日)

中华民国史第二编代序

北洋军阀的兴亡*

李 新

中国军阀是封建性的事物。它只存在于中国封建社会和半封建社会。军阀一般都具有三个特征：首先是它有一支私人的军队。这支军队由一个首领通过家族、亲属、同乡、同学、师生等封建关系的网络统率着。其次是它总要占据一定的地盘。地盘可以有大有小，小的只占据几个县或稍多一些地方；大的可占据一省、数省乃至全中国。第三是军阀在它所占据的地盘上实行个人专制的直接军事统治，既不讲“文治”，更不讲“法治”。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里，中国产生过不少的古代军阀。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于是逐渐产生了近代军阀。

中国近代军阀的形成是从北洋军阀开始的。从1895年袁世凯小站练兵至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这十六年，是北洋军阀的孕育阶段。从武昌起义至清帝退位，继而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这一时期，可称为北洋军阀形成阶段。武昌起义爆发后，清政府无力应付。袁世凯东山再起，不仅控制了北洋军，并且进而控制了清政

(*) 这是1982年9月纪念编写中华民国史十周年所作的报告《军阀论》的一部分，因为它概述了本编内容的核心而不是其全体，因此用它作为本编的代序而不称为序言。

E66/23

府,不久又就任临时大总统,夺取了全国政权。这一时期,北洋军才完全表现出是袁氏的私军。从这个意义上讲武昌起义给了袁世凯北洋军阀形成的机会。当然,这种历史结果并非发起和领导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始料所及,主要是客观形势使然。

北洋军阀的产生是与中国这个老大封建国家殖民化的程度日益加深分不开的。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在这一时期,中国的资本主义有了发展,不仅帝国主义对华投资大大增加,而且在它的刺激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也有所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比中国原有的自然经济和小商品经济要优越得多。由于资本主义经济集中,它所产生的政治力量要相对的强大一些。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当然也要影响到意识形态。不过在中国,直到“五四”以前,资产阶级的思想力量还是比较薄弱的。殖民化的资本主义,固然是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的,但它对中国是一种新事物,这种新的因素影响到中国社会各个方面,北洋军阀的出现就是其重大影响之一。

北洋军阀的出现还由于封建势力依然存在。分散的个体经济在中国的经济生活中一直占着压倒的优势。此外,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在中国有雄厚的根基和强大的生命力。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其重要原因之一是缺乏精神条件。革命前,资产阶级作了一些思想启蒙的工作,但远远不够。所以后来又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出现。

封建势力依然严重存在,而殖民化程度日益加深,资本主义又有所发展,这就是北洋军阀产生的历史背景。由于有这样的历史背景,北洋军阀就具有很多中国古代军阀所不可能具有的特点,虽然从根本上看还有更多的相同之处。

北洋军阀以及所有的近代军阀与古代军阀的最主要的区别就

是他们都近代化了,也就是说,它们都程度不同地具有资本主义的色彩。根据他们近代化程度的不同,我们把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近代军阀称为旧军阀,而把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的军阀称为新军阀,因为前者的封建性更强,而后者近代化的程度更高。但是无论旧军阀也好,新军阀也好,都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产物。近代中国的主要统治势力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而帝国主义又是最主要的力量;因此近代军阀不仅是封建势力的代表,同时又是帝国主义势力的代表。中国近代军阀,无论新旧军阀,除极少数例外,大多有帝国主义的背景或后台,有的军阀甚至完全成了帝国主义的工具。这与古代是大不相同的。中国古代军阀虽然也有个别向外国称臣纳贡的,但因中国古代的封建文明比较周围各民族都发达得多,所以这样的事例是极少的。近代的情况就不同了。帝国主义势力比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势力强大得多,中国军阀与帝国主义列强的关系只能是依附的关系而不可能是平等的关系。所以依附于帝国主义也就成为近代大多数军阀最根本的特点之一。这在北洋军阀身上首先表现出来。

现将北洋军阀的特点,择要具体地分述如下:

(一) 采用外国兵制。甲午中日战争以后,清廷感到原有军队,无论八旗兵、绿营兵,还是湘、淮军都不足依恃,开始效法外国兵制编练新军。北洋军自其前身新建陆军时代起,就仿效德国的兵制操练。以后袁世凯又聘用大批日本教官,使北洋军西洋、东洋兵制兼备。北洋军不仅编制完全效法帝国主义国家,兵器也大量购自外洋。早在镇压太平天国时,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即称羨外国船坚炮利,开始购置外国军火,并陆续举办一些军事工业。袁世凯继承他们的传统,北洋军兵器全部近代化,而且基本上购自外洋。北洋军阀也曾举办一些工厂自造军火,不过因为造出

来的兵器质量差，因此主要地还是依靠进口。依赖外国的武器装备，始终是北洋军阀的特点。后来的西南军阀，乃至国民党新军阀也都如此。

由于采用帝国主义国家的装备和军制，北洋军就不能不学习西方的军事思想。随着西方国家军事思想的输入，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当然也会对北洋军人产生一些影响。但这不是主要的，北洋统治者对此是极力抵制的，北洋军阀治军的主要思想还是封建观念，即以忠、孝、节、义为中心的三纲五常、四维八德那一套。

（二）北洋军阀的财政来源已不完全依靠封建经济。在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以前，封建军阀的军队饷源主要依靠田赋等税收。湘、淮军也基本如此。北洋军则大大不同了，其饷源大宗，往往来自关税、盐税，和官办企业的收入（铁路、轮船局等）。袁世凯死后，北京政府交通部与地方军阀争吵不休，多由地方军阀截留铁路收入充作军饷引起。北洋军阀另一重要的财源是借债——发行国内公债尤其是向帝国主义借外债。

北洋军阀不仅在军事上依靠帝国主义，而且在经济上、财政上也依靠帝国主义，这就为帝国主义在政治上干预和侵略中国提供了方便，北洋军阀大都卖国。他们为了吞并他人，为了镇压人民的反抗，就要无休止地扩军。而养兵是需要钱的，养的兵越多，需要的钱也就越多。军阀自己解决不了，怎么办呢？借债。内债不行就借外债。而借外债就要拿出中国的主权作交换条件。所以北洋军阀，特别是控制中央政权的大军阀，都是卖国者。卖国者必然要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这就是北洋军阀最终覆灭的根本原因。

（三）北洋军的兵源主要依靠招收破产农民或其他劳苦群众，也有些无业游民。总之，北洋军阀实行募兵制。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这种办法也被称为志愿兵制。而当时中国是谈不上什么志